

观念的调适

——民主·科学·自由在近代中国

闫润鱼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观念的调适

——民主·科学·自由在近代中国

闫润鱼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观念的调适:民主·科学·自由在近代中国/闫润鱼著.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4

ISBN 7-80128-549-2

I. 观…

II. 闫…

III. 政治思想史—中国—近代

IV. 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7554 号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编:100101

电话:64924761 64924716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1168 1/32 10 印张
字	数	22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25.00 元

12

前 言

前 言

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的主旋律,不同名目的“西学”乘国门洞开之机纷纷涌进,争相为国人追捧。与技术层面的西学不同,观念层面的西学在进入中国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传统文化、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挑战。为使它们能适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需求、政治心理以及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需要,一些思想家试图利用和挖掘固有的思想资源对其进行积极的“调适”。在近代中国产生过影响的西方观念有多种多样,要想在有限的篇幅中对其面面俱到地论述,既非力所能及也没有十分的必要。选择一些最能代表“西学”特征的观念作为考察对象,或许能更典型地将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观念时作何种抉择的情形展示出来。

在近代西方,实现或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和目标,而“民主”、“科学”则被确立为实现这一目标必不可少的手段和途径。有关民主、科学、自由的这些观念为近代西方的大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而社会的发展又反过来丰富了这些观念的内涵,扩大了它们的影响。在近代中国,所谓西学东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指以民主、科学、自由为代表的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情形,民主、科学、自由几乎就是西学的代名词。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这场被许多人视为“西化”的运动,就是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以实现或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利”为目标的。基于这些情况,本书便

以民主、科学、自由为对象,展开对于中国人是如何调适外来观念的探究。

民主、科学、自由在西方社会所处的地位,使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研究的重心,一部民主(以及科学、自由)发展史也就是关于民主(以及科学、自由)的学说史,民主(以及科学、自由)有多古老,对民主(以及科学、自由)的研究也就有多久远。在近代中国,由于“西学”意义上的民主、科学、自由对于国人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所以,人们对它们的所谓研究,解读的成分要大于建构的成分,即使是在对这些观念有了相当了解和理解的情形下,对它们的研究也因目的和具体对象的不同而难以与西方相提并论。不过,民主(以及科学、自由)在近代中国的曲折经历,也为研究者提出了与西方民主(以及科学、自由)研究不同的要求和任务。接受一种在自己的传统基因库中稀缺甚至根本不存在的观念,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尽管这些观念因与近代西方令人羡慕的发展联在一起,而为人所追捧提供了依据,但不论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还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情,则又为这些观念进入人们的头脑设下了障碍,所有这些情形都是西方社会及其学界未曾遇到的。

对那些与我们的文化、传统、习俗、心理等完全不同的观念,人们是选择接纳还是抵拒? 接纳哪些方面、抵拒哪些方面? 接纳或抵拒的理由是什么? 为使接纳或抵拒获得成功该凭借什么资源、运用什么技巧? 等等。这样的选择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本书中所谓的“调适”过程。绝对的接纳或抵拒,在中西交往已成事实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民主(以及科学、自由)或其中的某个部分之所以为人们接纳或抵

拒,是因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们已经被“调适”过,即被赋予了接纳或抵拒的正当理由。也许有人会说,如此的“调适”是对西学的一种“误读”,但在笔者看来,“误读”自有“误读”的原因,有意识的“误读”在某种意义上正可被视为一种“建构”或“中国化”的努力,更何况,所谓民主、科学、自由即使在西方也不是一幅面孔,它们的多样性和繁杂性是其不变的特性。迄今为止的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民主、科学、自由问题的研究成果虽不计其数,但动态地考察国人在面对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观念时,是如何下“调适”工夫的研究则并不多见。笔者相信,展开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对于拓展和深化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很有意义,还可以增强我们的历史感,使我们对于前人的选择及其带来的理想或无奈的后果多一份同情和理解,而且对于当今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建设也是有积极的启迪意义的。

本书正文部分共有四章:第一章,民主观念的调适;第二章,科学观念的演绎;第三章,自由观念的培植;第四章,民主政体的讨论。在“民主观念的调适”这一章里,笔者首先对“民”在传统社会所扮演的政治角色、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重民思想,以及民主在西方是什么,进行了历史的和相互比较的考察,目的是为西方民主观念进入中国后将会给人们的思维以及政治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提供一种铺垫和合理性解释。

书中论述到,在传统的政治思想中虽然不乏丰富的重民思想或以民为本思想,但民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不享有主人翁的地位,民是君主手中的一种砝码或可以利用的统治资源,重民与否或重到何种程度,多半以君主的好恶或对现实政治局势的判断而定。总之,在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中,没有给

民的参与留下多少空间。这预示着,在近代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一定是障碍重重。为此,思想家们一方面着力在民众中间培养支持民主政治的权利观念、义务观念,试图转换“民”的政治角色,即由“地域民”变为“参与民”,由被动的客体变为自觉其责任和义务的主动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民”因被倚重而一步步变成了受批判的对象,由“重民”向“国民性改造”思潮的演进,从一个侧面记录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轨迹,反映了君权的逐步衰退和国民在社会转型中所扮演角色的转换。另一方面,思想家们努力将民主调适为可以为国人所接受的概念,比如,将 democracy 一词煞费苦心地调适为“民权”,以与“民主”相对,试图表明:democracy 只意味着民从君那里分得部分“权”,绝非有取君而“主”国之意。再如,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推行议会政治制度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将 parliament 的功能由立法和监督行政调适为用来促成上下一心或统治者与人民紧密团结的凝合剂,等等。在作这些调适的过程中,传统的重民思想、上古三代的“议院政治”都是他们挖掘和利用的资源。

伴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民主被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不断地进行着调适,仅在“五四”前后它就经历了由“民权”到“人权”、再由“人权”到“德先生”的演化,并被区分为“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等不同性质的民主。

“科学观念的演绎”这一章,从“科学与科学主义释义”出发,指出笔者所探究的科学观念,实指科学主义意义上的科学观念,揭示了科学主义的哲学渊源、它的基本特征及其遭到的学术批评。与民主和自由不同,科学在近代中国可谓一路绿

灯,到戊戌维新时期它已经“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科学被赋予愈来愈宽泛的内涵,承载的使命也随之溢出本应承担的范围。科学的功能范围无所不在,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无处不适用,科学被宣布为“万能”,对科学的尊崇发展为势头强劲的唯科学主义思潮。在西方,科学主义的勃兴是与科学的大发展相随相伴的,而在科学极度落后的近代中国,科学主义思潮反比西方流播的更加有力,“科学”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科学被演绎成一部现代神话。科学主义在近代中国之所以有这样一种与历史发展规律“相悖”的展开过程,显然是与思想家们对西方科学观念的调适分不开的,正是他们的努力,将科学的欠发达由对科学主义兴起的制约性因素转化为刺激其发生的积极力量。

在人类思想史上,大凡一种有影响的思想或思潮,通常会伴有另一种与之相反的思想或思潮存在,与科学主义相伴的便是各种反科学主义思想和思潮的活跃。传统中国是一个儒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儒学重视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彼此融洽,这种态度与科学主义者所持的人征服自然的^{vs}态度在根本上相悖。因此,当科学主义呈泛滥之势时,反科学主义的思想不仅异常活跃,而且还特别自觉地调动或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诘难科学主义,使在西方主要地表现为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争论,在中国这个学术舞台上不同程度地演绎成中学与西学之间的争论。

第三章是“自由观念的培植”。与民主、科学不同,“自由”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本没有西方近代形成的那种以保障个人权利为宗旨的政治自由观念。中国人是在民族帝国主义“汲汲焉求扩张权利于他地的时代”(梁启超

语)到来时,才逐渐接触到西方的自由观念的。“自由”进入中国的这种特殊境遇,限定了它在近代中国的角色扮演。因此,在思想家们的笔下,不论如何解读自由,自由存在的合理性总离不开它在救国救民方面所能体现出来的价值。且不论严复、梁启超等人明确地将在西方保障个人权利的自由调适为有助于国家富强目标实现的自由,即使是像“五四”自由主义者力图在“讲到底”处为个体确立本位,也不能不受到自由资源“稀缺”的影响。他们所谓个体本位的自由,其实并没有给个体留出足够的空间。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曾经给予个体的自由又在不知不觉中收回。~~自由主义~~无自由

在西方,自由主义既是一种学说,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运动,而且在许多国家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制度。^① 探究近代中国人对于自由观念的调适,有必要进到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实践过程中进行考察,因为作为一种运动的自由主义和作为一种学说或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是不可分离的。自由主义者的结社、结党、“舆论干政”等不同面向的实践,既反映出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观念进行调适时所依据的思想文化基础和现实政治背景,也能藉此认识和理解自由主义者的性格特征,并对他们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有可能对自由主义作出调适、或者说调适会产生怎样的结果而有所期待。自由主义者在阐述和建构自由学说、开展自由主义的运动时,尽管有不少人非常自觉地考虑到了中国的国情,但自由资源的奇缺依然使他们无法避免处处碰壁的尴尬和无奈。

第四章是“民主政体的讨论”。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关

^① 参见李强:《自由主义》,第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政体形式和政体分类的思想既悠久又丰富。而在传统中国,由于政体形式严格地讲只有君主(天子、国王、皇帝)专制一种,这种专制具有“先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而在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关于政体方面的思想并不多见。关于政体形式的讨论,是在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后才出现。“民主政体的讨论”与“民主观念的调适”虽在“民主”问题上有一定关联,但探讨的角度完全不同,即这一章专门围绕政体选择的问题展开。关于政体方案的选择和设计,有基于对已经实行或将要实行的政体的不满而提出的替代性方案,如以“开明专制”抵拒立宪共和、以“君主立宪”“变易”共和立宪、以“乡村自治”替代民主政制等。也有在中西古今不同政体形式基础上,尝试“独创”一种“中西合璧”的民主政体的努力,如孙中山“发明”了五权宪法,希望以此来“补救”三权宪法的“不完备”;为了使政府有能、人民有权,把政府打造成听人民的话、为人民谋福利的“万能”政府,“发明”了政权和治权分立的思想。在进行这些“发明”的过程中,孙中山把西方立宪政体中的“分权”转换成“分工”,把西方政体学说中重点探究的权力部门之间的关系,转移到探究“权”与“能”的关系上。

自西方各种形式的政体进入中国人的视线以来,关于政体问题的探讨就没有停止过。在立宪、共和、训政等政体相继操练过一段时间后,当“九一八事变”再度将中国人逼到政体选择的十字路口时,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一场有关政体问题的学术大争论发生了。争论中至少提出三种政体主张:民主、独裁和“修正的民主政治”。民主与独裁分处权力谱系的两端,而“修正的民主政治”则居中。民主政治派虽旗帜鲜明地坚持民主政治的立场和原则,但却给人一种英

雄气短之感觉；独裁派认为民主政治在当时已经不能被委以重任，它必须由独裁来替代之；而“修正的民主政治”派，虽然在根本处认同民主政治的价值，但却认为它在实行了上百年的时间后，已经是弊端重重，必须对其“修正”之。对于民主政治不论是坚持还是放弃或“修正”，都是思想家们对其进行的调适，即挖掘和利用不同的资源为其涂抹上了不同的品格特征。有的调适主要出于现实的需要或工具性的考虑，有的调适则顾及到终极性的价值问题。

思想家们进行的种种调适，无论成功与否，都付出了他们的智慧和努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品味的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更何况，观念的调适是不能简单地用成功或不成功来作判断的。王希和在批评独裁论时曾言，民主政治的好处是“拉长了看的”，同样，近代历史上思想家们所进行的种种调适，其价值或许也得“拉长”了来看。一些曾被认为脱离现实的“空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政治运作的科学化以及政治家智慧的不断增进，也许就不再是空想。

本书中不论是对西方民主、科学、自由观念的梳理，还是对近代中国人对这些观念的调适的探究，基本上都没有纳入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有关内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科学、自由的观念比较独特，它与我们考察的对象大体不在同样的思想脉络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表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具有高明的“调适”智慧和技巧。对此，需要另有专门的著作进行探究。

目 录

前 言	(1)
-----------	-------

第一章 民主观念的调适

第一节 民:政治角色的转换	(1)
一、传统的民本思想	(1)
二、民本思想的复活	(4)
三、“欲新其政,必先新其民”	(11)
四、“五四”前后的国民性批判思潮	(20)
五、转换的意义	(26)
第二节 民权观与议会政治理想	(29)
一、民主政治与民权思想的关系	(29)
二、民权概念的转化	(31)
三、初识西方民主	(34)
四、“中西合璧”的议院设计	(38)
五、“议院以学校为本”	(43)
六、“议院政治古已有之”	(45)

七、调适的意义	(47)
第三节 从“人权”到“德先生”	(51)
一、“民权”到“人权”	(51)
二、“人权”到“德先生”	(58)
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	(62)

第二章 科学观念的演绎

第一节 科学与科学主义释义	(68)
一、西方的科学主义及其哲学渊源	(68)
二、科学主义的特征	(75)
三、对科学主义的批评	(79)
第二节 科学观念的现代神话	(83)
一、科学“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	(83)
二、科学的功能范围	(91)
三、科学的方法和精神	(99)
四、推崇科学的个案分析	(107)
第三节 “玄学”的挑战	(113)
一、“西方科学破产了”	(113)
二、学衡派的诘难	(118)
三、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	(124)
四、科学观念演绎的历史启示	(132)

第三章 自由观念的培植

第一节 自由与自由主义释义	(139)
一、自由主义的出现	(139)
二、洛克和孟德斯鸠的自由学说	(144)
三、自由主义的思想特征	(152)
四、传统中国的“自由”	(158)
第二节 观念层面的调适	(161)
一、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与使命	(161)
二、何处“存我”	(163)
三、团体自由重于个体自由	(170)
四、“国为人而设,非人为国而设”	(175)
五、以国家为“宾”、个人为“主”	(180)
第三节 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实践	(186)
一、自由主义者的结社和组党	(186)
二、难产的“中国自由党”	(189)
三、无可奈何的“舆论干政”	(201)

第四章 民主政体的讨论

第一节 替代民主政体的几种方案	(221)
一、以“开明专制”抗拒立宪共和	(221)

二、以“君主立宪”“变易”共和立宪	(233)
三、以“乡村自治”替代民主政制	(238)
第二节 “中西合璧”的民主政体理想	(256)
一、以五权宪法“补救”三权宪法	(256)
二、“政权”与“治权”分立	(265)
三、“分权”与“分工”	(272)
四、进入实践领域的“权”“能”关系	(277)
第三节 关于政体选择的学术论战	(282)
一、“走哪条路”	(282)
二、第一种政治：专制或独裁	(285)
三、第二种政治：民主	(290)
四、第三种政治：修正的民主	(297)
五、政体选择中的功利与价值	(301)
后 记	(311)

第一章 民主观念的调适

第一节 民：政治角色的转换

近代中国政治和政治思想的主流是借鉴西方的经验和做法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民”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传统的重民思想或以民为本的政治原则成为思想家们构建其政治理想时着意挖掘的对象，呼吁“重民”蔚然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有趣的是，“民”在这个潮流演进中，逐渐由被倚重的对象转化为广受批判的目标。

一、传统的民本思想

谈到中国的传统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广为人们熟知，它出自三千多年前的《尚书·五子之歌》。《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政事史料汇集，其中载有大量的有关民心向背对于政治影响的言说。此后的历代思想家包括一些有抱负的统治者，从王朝更替兴衰的历史事实中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民众的作用，并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以民为本的道理。周

初的统治者曾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①、“民人所欲，天必从之”^②的政治意识。孟子认为在所有的国家大事中，人民是最重要的，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他把天下的兴亡系于民心的向背，认为“得道”与“失道”均在于民心的得失：“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④。荀子形象地把民和君的关系比喻为水和舟的关系，强调“水则载舟，水则覆舟”^⑤。唐太宗在与大臣的对话中，援引荀子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了民水君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反复强调“载舟覆舟，所宜深慎”^⑥，劝戒掌权者要顺乎民心。

西汉著名的思想家贾谊，虽然坚持君权“尊不可及”的等级思想，但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秦王朝的历史事实却使他确信“民无不为命”、“民无不为功”、“民无不为力”、“民无不为本”。他甚至不无深邃地提出“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民必胜之”^⑦，重民实际上构成他尊君思想不可分割的部分。孟子在阐述其民本思想时，强调君应该与民同乐、与民同忧，“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⑧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孟子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以天下万民为社会主体

① 《周书·泰誓中》，《尚书》，第14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② 《左氏春秋》，第246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孟子·尽心》下，《四书》，第376页。
④ 《孟子·离娄》上，《四书》，第302页。
⑤ 《荀子》，第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⑥ 《君道第一》，《贞观政要》，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⑦ 《新书·大政上》，《贾谊集》，第1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⑧ 《孟子·梁惠王》下，《四书》，第247页。